

# 生活是文学永远的恩师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 从生活中生出的枝蔓

□ 李思纯

人一生中总有些因缘分你做出某个勇敢的决定，或是开始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就拿文学创作来说，比如碰到一个老师、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因此便打开了一扇门，你不知不觉跑了进去，然后这扇门便将你关在里面。你的余生是否因此变得更有意义，你在里面停留的时间长短，都取决于那扇门和门后致命的吸引力。

而我的那扇门，应该跟一本书有关。我家姊妹众多，因为都是女孩子，帮父亲挣不了工分，母亲就节衣缩食供所有姊妹读书，希望我们个个都能走出大山去。但那时候实在很穷，除了课本基本买不起闲书。直到我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才从姐姐的抽屉里发现了课本以外的书籍。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套巴金先生的《家》《春》《秋》，一本没有封皮的《中草药图解》。那时候我这个姐姐已经从安康师专毕业了，家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也能像她一样顺利考上中专。当一家人都在忐忑不安等待考试结果的时候，我却躲在屋里读小说，整个人沉浸在党、党性和革命、革命的故事里，时而为党民热血沸腾，时而为鸣凤哭——我被小说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所牵引，也完全被巴金先生所折服。后来又陆续读到古华的《芙蓉镇》和路遥的《人生》，还看到了这些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小说家由此在我心里变得伟大而神秘。

其实那时候我就有了一个超大的梦想，将来我要当作家，写小说。

但真正开始将写作当成精神的出口付诸实践是在多少年之后了。

那一年，我的家庭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丈夫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幼女眼疾、父亲患癌去世。那年寒冬腊月，雪下得很大，等驾坡城中村的出租屋冷得跟冰窖一样。生活不能承受之重，很多个冻得浑身哆嗦的夜晚，我蜷缩在被窝里不能入眠。好在房间里有一台姐姐送我的旧电脑，我给自己建了一个博客，开始在里面写诗、写散文。但是，我并不想写伤感和苦难，相

反，我渴望文字能表达内心祈盼的热烈、温暖，对未来美好的希望。我写了许多工作中的人和事，那时候感觉文学离生活很近，以为将生活的面目还原就当是文学。

随着不断地学习和深入，深刻认识到文学对写作者和读者具有双重的教化作用。文学引导写作者从各个层面和角度看到人世间的真、善、美，引导写作者建立美学观念并应用到文字叙述中。通过阅读作品引领读者真诚、向善、感知美好。这个美好包括自然的美好、人性本善的美好、对弱者的慈悲、对苦难的悲悯和站在人性高度观照世间的大爱。文学必须具有的审美和生动丰盈，依靠作者通过自身的写作经验创作内容，灌输真情。认识到这一点，我开始对叙述对象的选择，以及自己的叙述手法运用开始变得慎重。怎样从小处着眼，展示意料之外的真情？怎样落笔铺陈才能让文章赏心悦目？记事为了写人，写人为了展示爱——如何通过散文写出对生活对土地的爱、对亲朋好友的爱、对弱势群体的爱等等，这些问题随着创作逐渐突显出来，促使我通过广泛深入的海量阅读积累知识，拓宽眼界，从而获得更多的我想要的写作经验、技巧以及素材。

因为经历的许多坎坷和身心背负了很多沉重的东西，有一天突然觉得，诗歌和散文已不足以表达我的所思所想，于是我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对于没有什么小说创作经验的我来说，创作的重要源泉来自工作和生活。我笔下的小小说人物大多有原型，但这原型可能是单个的，也可能是多个人的综合体。下笔的时候，他们的形象逐一从脑海中跳出来，邻居、故人、同学、偶尔邂逅的陌生人……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一一与我想写的人物分解、过滤、重组、重叠。有时让我像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候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平常捕捉到的东西就悄无声息的显现出来，笔端随着生活的流淌写不同阶层不同命运之间的世事纠葛，写下敏锐的个人在面临漩涡时的恐惧、闪躲，面对苦难的哀叹、悲悯，面对温暖的唏嘘动容。

## 作家始终是群众的一分子

□ 陈武成

2016年，一直做教育工作的我，被借用到文艺宣传部门工作。

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我是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偶尔写点小文章，随笔散文多一些，大都和教育有一些关系——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校工作，除了教育，其他行业我都不熟悉。也写过一点小说，主人公大都是老师，仍然是自己熟悉的教育生活。其中有一个中篇，是写教师调动的，读了的人都认为写得比较真实。特别是有调动经历的老师，都认为写的就是他。我后来调到县城的中学工作，不少从乡下调进县城中学的老师都私下询问我是怎么知道他们调动的故事的？我说我不知道，是瞎编的，他们都不相信，说不可能，瞎编怎么会编得那么像？我只好说是我亲身经历的。他们这才拊掌而笑，肩扁搭背于我，视我为同道之人。

借用到文艺宣传部门工作的时候，领导说，你有写东西的爱好，过来好好写点东西。我频频点头。可是当我准备开始写点东西的时候，却惶恐起来了，我不知道写什么了！我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当时，扶贫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铺开，从村组到乡镇，到县级各部门，人人都投身到扶贫攻坚的洪流中去了。我们

在相关部门的组织安排下，也下去了。我们到乡镇，到村组，到贫困户家中去。这一去，给我打开了一道门，一道极阔的大门！从那道门跨进去，我看到了无穷无尽的、无比丰富的生活画卷，感受到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和让人目不暇接而又惊喜不断的场景和风貌！这一切都是触手可及的真实的存在，即使如椽大笔也难以书写穷尽啊！

我被打动了，也被感动了，我感觉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到正阳去采访，根据残疾人李自强的自强不息的经历，很快就写出了纪实小说《龙洞河之恋》。又根据女强人宁约桃创业的过程，写出了小说《天上的彩樱》。《天上的彩樱》最先发在自媒体上，引起了《安康日报》的关注。安报的编辑联系我，我要将小说压缩到一万字以内，然后他们用整个版面予以刊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后来，我到洛河去采访，碰到了洛河镇上的一名女干部。女干部为了扶贫工作，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她红着眼圈说，她感觉她儿子都快不认识她了。女干部还很年轻，穿着一双很漂亮的皮鞋。只是她刚从村上回来，泥泞的道路已经将她的皮鞋弄得面目全非了。我的心被女干部的红眼圈和沾满了黄

这时候，文学就像是生活中生出的枝蔓，我因为它沐浴阳光而快乐，因为它滋生新芽而雀跃，因为它茁壮成长而欢欣鼓舞。同时，我在它身上感受着生活跳动的脉搏，隔着距离，能清晰地看到生活的枝干，看清根系沿着血脉的走向。

但是，文学不是新闻。特别是小说，那更是新闻背后的东西。小说的英文是fiction，也就是“虚构”，所以写小说的时候首先告诉自己“假的”，绝对不是现实。真的只能是新闻，是历史。那么，我在编故事的过程中，就是透过我的眼光、我的看法去表达。就连现在的报告文学，也不是直接记录和还原新闻，它的在场还要气氛烘托、它的背景还要文字渲染，通过生动的笔触和文字的韵律，赋予真实事件和人物以美的意向，让文章娓娓道来，不枯燥、不干巴、不刻板。所以，将自己置身文学的沃野，首先要接受生活的多面性，接受万物美好的同时，也要接受这世间苦难的人生，以及我们周遭可能随时显露的卑劣的人性，接受所有不完美带给我们的遗憾和痛心，并学会站在侧面和背面冷峻的观察与思考，把我们观察到的生活碎片连成一体，举重若轻地落到人心和社会问题的重心上。

“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理解这个“高于”是说文学作品与真实的俗世生活得有一定的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脱离生活实际，脱离时代背景，内容就容易空洞干涩；太近，容易俗，容易失去美的想象。把握好作品与生活的距离，作品的精神才能迸发，才能产生语言的张力和魅力。

在如今世故与物质化的社会中，文学或成为部分人束之高阁的精神供养品，或成为部分人手机里视线线流淌的另类快餐。但真正热爱文学的写作者，依然会在漫长的生命里保持着一份纯粹。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也依然会像一束光，伴随和照亮庸常的人生之路。

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碎片中淘取闪光的部分，孕育和发酵，让文学的枝蔓蓬勃向阳，鲜花盛放。

我偏爱小说创作，是以为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抛却条条框框，多一些自我发挥。真正开始创作的时候才发现，脱离了生活的小说创作就像一只氢气球，飞着飞着就找不着北了，更找不着回来的路。经过一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体悟到：小说创作更应该像放风筝，创作者手里得有线牵着，这个线就是生活。有了生活的基础和痛点，风筝无论飞多远，都能收放自如。

2018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条一条的鱼》发在《延河》，时隔多年，每每想起都会感慨良久。那年，我在下乡扶贫的途中，看到贫困户家里晒了很多小鱼干，据说这些鱼都是他夜里淌着冰冷的河水钓回来的。那种鱼钓起来很不容易，卖得自然就贵了。鱼卖不出去，他急我也急。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起一幅画面：寂静的深夜里，一个瘦弱的身影在河水里徜徉，晨曦微露之时，他的鱼篓里只有三五条小鱼。日复一日，他晒了满满一簸箕小鱼干……这个场景一直折磨着我，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去给身边的人分享、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我帮他把鱼卖出去了，也把小说写完了。如今翻看那段文字，我依然会感动，不是为文字，而是文字里的那个活生生的巴山汉子。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在晚饭后沿着岚河堤岸散步消食，总能遇见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里敲锣打鼓唱花鼓子，因为扰民因为曲调凄婉，他们常常被撵，就像打游击，神出鬼没，我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段遇见他们。他们是刚刚搬进城里的高山移民，他们用自己的娱乐方式加入城市的夜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有几次，我驻足专心听他们唱歌，虽是方言土语，却有腔有调，韵脚押得自然流畅。就这么听了三五回，我就动手写《铿锵锣鼓》这篇小说，我写老罗对城市的渴望，写他对乡村的怀念，写他无法融入新生活的无奈。写到最后我自己满眼泪花。

虽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但常写常新。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切口剥开，一层一层剥下去，一定能触摸到酸得泪目、甜得发腻、苦得挫牙、辣得心悸、热气腾腾、五彩斑斓的生活底色。我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写我的作品，用最普通的语言写最普通的生活，我以为这就是接地气。

对于小舞台艺术作品也一样，取材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艺术加工以后，他们还能认出来，还能为之一笑，还能心酸落泪，这地气也就接上了。

## 故乡是创作的活水

□ 万世长

和许许多多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孩子一样，我见证了种种艰苦，精神世界的特征相当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熟悉所有通向村子的路，就像它们是自家的，自己身体附带的；也熟悉由它而命名的每一座山，山上的每一种树，每一种草。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喝着它的山泉水，吃着由它的土地生长出的粮食，头枕草席长大。鉴于此，它对我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

就像我的根，深深扎入泥土深处，来自源头的“活水”翠绿了我身上每一片叶子。由刚开始的挣扎，转换为后来的安静，这都源于生活的长期积累沉淀。我是幸运的，那时候，我有一群羊，我有一个爱养羊的父亲，他用锄头教我在土地上写字，长出来一片片庄稼的文字；那时候，我有一本厚厚的历史书，它们从邻居的口中说出，乡音结出的果实，一直甜到了我的内心最深处；那时候，我喜欢我那个花花绿绿的小书包，我有一个喜欢缝缝补补的母亲，她在院坝里的星空下讲故事，我坐在她身边，一会儿随着仙鹤飞走，一会儿又打着金银财宝归来……

我们的生活都有着鲜明特征，这种特征往往是精神世界的诞生之地。就像我冥冥之中就有的乡土情结，不用观察，就知道深夜从窗口经过的人，他们的相貌轮廓，仅凭脚步声我便能分辨出。一声咳嗽，也是相通的温暖，从衣服上翻上爬下的蚂蚁身上，也能领悟出不同的细节，鸟鸣声的多元化，和蛙鸣颇具情节性的叙述文字，连憨厚的甲壳虫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自己从出生地汲取创作“活水”来得更为直接，更为便捷的了。它是我们的另一个自己，表达的功底和站立的角度，都足够真实，以一个现场者进入，抒写一个时代的标记。

直面这些环境，又反思这些环境，这是文学价值取向的共性，也是走向精神世界的必经之路。而然，我只是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进行填充，将这一切自觉记录，由它承载的环境。

但是，要从日常琐碎的生活提升至文学的高度，并凭借文字完整表达出来，丰富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如若，我不曾有上山放羊的经历，永远不会知道，一只羊也会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撒娇；倘若不曾曾在泥泞的小路上奔走，永远也不会不到，被稀泥缠住脚，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倘若不曾跟在大人身后学着种庄稼，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庄稼们也是会生病的，它们的知冷知暖，和追求人类的命运是相通的。

创作与生活，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生活的追问源于美好，创作的探索应怀有敬畏之心。我给自己的规劝：写自己所熟知的，写自己有能力写好的。保持生活的热情，无论怎么去写，最起码，应该当对得起自己。

## 乐为人民歌与呼

□ 夏崇庆

八十年前的延安，文艺界精英荟萃。可在文艺为谁服务上，却出现了偏差。艺术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而不愿接触革命主体的工农兵。如鲁艺师生在礼堂排戏时，自己观摩技艺，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而老乡们却在外面拍着窗子，讥笑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不下（方言，不明白）”。基于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呼之欲出。从1942年5月2日到23日，在毛泽东、朱德等政治家和进步文艺家的引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充分交流畅所欲言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其核心就是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毛泽东鼓励号召“有出息的文艺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八十年以来，这著名的经典论断，对指导文艺乃至各行各业，甚至我们个人的工作方法仍具有鲜活的意义。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和众多的文友们一样，远离酒桌和牌桌，静心坐着“冷板凳”潜心读书，学习作文。一些“豆腐块”小文章，偶有见报。虽做不到“气自华”，但仍能修身养性，固守清高和内心的洁净。特别在长达二十年的乡镇“泥腿子”生涯中，与穿布鞋皮鞋“解放鞋”的乡镇村组干部

走在一起，与穿对襟“中山装”“四条筋”的农民朋友们处在一起，如四时农事，懂乡村冷暖。历时十年，八易其稿，终于写出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平静的乡村”，有幸挤进省政府“双百计划”，被公费出版发行。客观评估，不是写得多有高度和水平，是因为太熟悉。文章是秦头的“小山水”，而美丽的乡村山水，应是千书百卷的“大文章”。

供职党校，我们最大的工作是宣传和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知识。我们最多的服务对象，是最基层的党员干部群众。如何让党的“好声音”传进千家万户以及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党员群众耳中。我们坚持送理论服务“最后一公里”。理论宣讲小分队，到乡镇村组，田间地头，厂矿企业作业点，毛绒玩具生产间，给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使党的理论入脑入心，“声入人心”。

有点标榜和小自豪。其实，在我们身边，人们都在有意或无意识的践行着“讲话”精神。无数的良知作家们，像当年的柳青一样，脱掉雪白的衬衫，卸下鲜艳的领带，缠着陕北的白羊肚手巾，啜着关中的锅

盔就辣子，吸溜着陕南的浆水两掺面。在火热的乡村振兴主战场，发现典型，弘扬先进，传播正能量；“文艺大篷车”把“花鼓子”“兰花花”“第一书记”“清官巧断家务事”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戏歌舞，搬上舞台，送进乡村。哪里笑声最多，哪里花生皮、瓜子壳最多，哪里地方，就是“文工团”工作的地方；书法家义写春联，“版画”“剪纸”“民歌”进学生课堂，广场舞夜场不散，“王老九诗社”吟诗正浓……

“讲话”精神历久弥新。所有党员干部们坚持“人民至上”“群众利益无小事”。在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第一个到达的是我们党员干部，最后一个撤离的是我们党员干部。在鱼水相融相依的干群关系中，干部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把干部当亲戚。

身边的正能量，为我们这些业余小作者，提供了好典型好素材。为人民歌与呼，文学前辈们用经典诗词为我们做了导向和指引。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在奇花异木的树林里，我虽然只是一只普通的小鸟，但我做人云亦云的鹦鹉，也不做呱呱乱叫的乌鸦。我愿做一只啄木鸟，“算算算割”鸟或布谷鸟，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告知或传来春的美好讯息。

## 做一个放风筝的人

□ 段祖琼

生活以一团乱麻的形态长期存在，文学只不过是理出来几条清晰的线头，供人联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究竟有多大？因人而异。文学进入多元化时代，观察与发现，或许比纯粹的生活感受更让人受益匪浅。文学大多数时间其实是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感悟转化而来的，有直接从生活中汲取的，也有从文字、影视中领悟出来的，然后用文学的各种表达方式来呈现。

好的文学作品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不能说作家没有经历过另一个时代的事，就写不出有关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人类命运的话题总是相通的，就看如何去挖掘。读过一些书，结构、情节或许不同，感觉生活貌似退了场，细心的品读那些作品，读着其实在用隐形或非隐形的场景丰富着细节，让宏大叙事有了真实的情感，在不真实中获得真实，使读者相信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

“对生活介入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深度，而判断作家文学能力的关键就看他如何把鸡毛蒜皮的生活变成精彩的文学。”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学和生活是相互依存的。生活凭借文字的表述功能，写作过程中各种技法的应用，从而提升到文学的高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生活并不能直接转换成文字，而是通过大脑进行置换，记忆是不是绝对真实的？当然不是，任何人都无法完整的复原每个细节，在回忆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偷偷把自己置换成旁观者的角度，无意识进行了弥补、填充、回避、虚构，从而达到共性中的个性。

不难发现，生活与文学其实就是一个沉淀和提纯的过程，这就要求写作者要善于重新发现生活，不过分地降格或拔高。人类向善，向上，向美的价值观是相同的，作品所要传达出去的还是有关人类共性的差异化话题。

在这个泥沙俱下的写作大环境下，守点底线，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文学保持该有的好奇心，敬畏心；静下来写慢点，写少点，写得自己满意点。有些喜欢，身体力行就很好了，天底下没有那么多非己不可的事。